

任继愈 主编

中国

佛教史

第二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佛教史

第二卷

任继愈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佛教史 (2) /任继愈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11 月 (1997. 12 重印)

ISBN 7-5004-1078-6

I. 中… II. 任… III. 佛教史-中国 IV. B9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6260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8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4.625 插页: 2

字数: 508 千字 印数: 7351—12350 册

定价: 37.00 元

本卷执笔人：任继愈 杜继文 杨曾文

绪 言

本书第二卷，上接三国，下迄东晋。这一时期（共一百六十五年）的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不同于汉魏佛教。

汉魏佛教传播地区有限，信教人数也有限，多为上层贵族。时人认为它与黄老差不多。西晋时期，北方各民族，五胡十六国之间种族偏见极深，互相敌视，战胜者对战败者往往不分贵贱尽行屠戮。儒家教义被视为汉族的信仰，而佛教来自西方，比较容易为北方各民族接受，这个宗教很快成为北方各族人民（包括汉族）共同信奉的宗教，它这种优势远非道教和儒家所能比拟。佛教在上下各阶层取得信仰的统治地位后，对消除种族隔离，融合民族生活习惯，起过促进作用。“佛是戎神，正所奉祀”（石勒答王度奏），足以说明北方少数民族对佛教的态度。战争、杀伐连年不断，给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佛教宣传因果报应，戒杀生，劝说统治者少杀戮，为来世积功德，对当时文化落后，嗜杀成性的上层贵族来说容易接受；对当时饱受苦难的下层群众来说，也可从中得到某种精神安慰和“来世”幸福的虚幻许诺，因此它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机会。

由于佛教的势力增大，这一时期，译经的数量及质量

均超过汉魏，后来影响中国佛教的教派及宗派的重要经典的汉译本已基本具备。翻译质量也有所提高。三国及其以前，译经大都为少数信奉者参加，译经费用为信徒捐助。两晋时期的译经已由国家举办，有较为完备的译场组织，财力及人力均极充足。汉译经律论基本上是这个时期介绍过来的。鸠摩罗什的汉译本给我国翻译事业增添了光彩，为翻译工作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汉魏时期佛教重要人物都是翻译家，而两晋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以中国学者为主力军的佛教理论家，即所谓义学沙门。两晋佛教理论与当时中国流行的玄学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流派。佛教思想大量地、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以后，使中国的佛教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中观学派，在关中地区形成了一个传播中心，培养出一批佛教理论家。印度佛教的本来面貌逐渐被一些人了解，并发现它与魏晋玄学理论有区别。有的佛教徒不甘心使佛教当玄学的附庸，企图自张一军。这也是鸠摩罗什念念不忘的心愿。但由于玄学的势力十分强大，影响又很深远，来自西方的佛教中观学派，虽曾博得一时的赞扬，但终不能有所发展。当时佛教大乘中观学派既要摆脱魏晋玄学的束缚，还要与佛教内部的小乘流派作斗争。鸠摩罗什处在两面作战的境地，不得不发出“折翻”的哀叹^①。

^① 《高僧传》卷2：“今在秦地深识者寡，折翻于此，将何所论。”

两晋时期佛教的传播中心有三处，一在凉州，一在长安，一在庐山。凉州是佛教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中转站。有许多重要佛经的翻译是出自凉州。西方僧人到中国内地，往往先到凉州熟悉汉语。且该地不象关中是四战之地，为兵家所必争。北方广大地区常遭兵火，那里还比较安定。北方也有僧人文化人到那边避乱，这也是促使该地形成文化重镇的一个因素。鸠摩罗什借重姚秦的势力，在长安开创了关中中观学派。慧远继承道安在襄阳的传教事业，在庐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佛教中心。当年，道安在襄阳传教，也曾形成一个佛教中心，培养了不少有才干的僧人。但时间短，又值兵荒马乱的年月，他的事业受到不少限制。慧远传教活动时期，东晋社会比较安定，他又善于交接官府，弟子遍天下。庐山慧远僧团不但是江南佛教中心，在全国各地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除了他善于政治活动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学说适合于当时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需要。他把儒家的纲常名教与佛教的出世观念结合起来。慧远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容让^①，对鬼神学说的迁就，对佛教大小乘宗派矛盾的调和^②，从而使他的佛教思想把许多对地主阶级有用的东西融合贯通，兼收并蓄。因为，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

① 慧远以出家僧人大讲“丧服经”，为佛教史前所未有的。

② 觉贤被关中鸠摩罗什所排斥。慧远把他接到江南，予以安置，并致书关中，从中调停。事见《高僧传》卷2。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慧远在当时佛教界中，据有崇高的地位，就在于他的理论能够满足那个国家的需要，而不在于他的理论中包含了多少真理。实际上，佛教教人成佛寻求涅槃，这件事本身是一个大骗局，误尽苍生。

汉魏时，黄老与浮屠并列为祠祀崇拜的对象。佛、道二教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他们自己中间，都没有分清两者的区别。两晋时期佛教势力转盛，这时道教也有了发展。佛教和道教发生了争辩。这两种宗教为争群众、争君主的支持，争宗教宣传的地盘，各自制造自己的理论根据。

这时出现了《老子化胡经》，此经相传为道士王浮所作^①。故事内容大意为老子西出关，度流沙，教化胡人，创立佛教。佛教创立者不是西方圣人，而是东方去的圣人老子，佛是中国人的弟子。化胡之说起源甚早，并在佛道两教中广泛传布，长时期内没有人表示异议。因为汉魏时期佛教在中国刚开展传教活动，势力不象两晋时期那样强大，因处于劣势，巴不得攀附道教以自重。哪怕是传说也好，能与老子有些瓜葛，对佛教有利无害。佛教徒虽心知老子化胡说不足据，但予以默认。等到佛教势力逐渐强大，遂不甘心屈居道教之下，要独立门户，才对老子化胡之说展开攻击。佛教徒也制造了老子为释迦弟子的传说。说释迦生于周昭王时，远远早于孔子和老子，以抬高佛教，

^① 今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为后出，已非王浮所著的原貌。

贬抑道教。化胡之说本出臆造，不值得费精神为它论辩。但这一争执的形成过程刚好反映了佛道两教势力消长的痕迹。作为背景材料，也值得注意。^①

总之，从佛教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不得不随时变换着自己的面貌和精神，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它已成为中国封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和中国的官方支持的哲学发挥着同样的职能。以平等出世的姿态为世间的平等制度辩护。其理论虽超然物外，其社会作用半点也不超然。佛教在西晋初期完全依傍玄学，为玄学作注脚，等到势力稍大时，外来佛教徒虽也企图自张一军，但未能实现。它能做到的只限于对玄学的支持和补充。佛教推动了唯心主义哲学的深化，对中国哲学的影响至深且巨，这个作用我们不能低估。

两晋与南北朝相衔接，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基本未变，东晋与南北朝的学风有着直接继承的关系。佛教中有些学派还在继续形成和发展中。由于南北双方政治上长期分立，地区文化的差异也较两晋时期更为显著。儒、释、道三教又联合又斗争的形势更加复杂。这是本书第三卷所要涉及的内容，这里从略。

本卷第二章《六家七宗》一节由余敦康执笔。全书由刘苏同志担任抄写及校对工作。

① 王维诚著有《老子化胡考》，（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四卷，第二号，1934年）立论精详，堪作老子化胡说的定论，可资参考。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西晋的佛教	1
第一节 西晋的社会和佛教	1
西晋社会	1
魏晋玄学的盛行	5
佛教概况和般若学者	8
佛教的社会普及和信仰情况	13
第二节 西晋的佛经翻译(一)	22
竺法护	23
聂承远和聂道真	35
第三节 西晋的佛经翻译(二)	36
竺叔兰和无叉罗	36
帛法祖	42
附：法祚	44
彊梁娄至和安法钦	44
法立、法炬	45
支法度和若罗严	46
第四节 竺法护译籍剖析	48
(一)译经概况	48
(二)佛的法身论	51
(三)佛的“色身”论	57
(四)“心本清净”与“客尘所蔽”	63

(五)“有想”和“无想”	69
(六)“汝即是道”	76
(七)大乘菩萨行之一——四等六度	84
(八)大乘菩萨行之二——植众德本	95
(九)大乘菩萨行之三——菩萨十地	103
第五节 佛教《般若经》思想与玄学	110
(一)无和空	112
(二)“虚静”、“返本”与“诸法不动”	119
(三)言意之辨和真、俗二谛	123
第二章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方社会和佛教	129
第一节 后赵政权和佛图澄	130
石勒、石虎与后赵政权	130
佛图澄及其传教活动	134
佛图澄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147
第二节 释道安	149
(一)释道安生活的时代	149
(二)家世和出家修学佛法(在今河北境内——公元312—约348年 之前)	152
(三)游学、避难和早期传教活动(在今河北、山西和河南一带地 方——约公元348年之前—365年)	155
(四)在襄阳的传教和研究、撰述(公元365—379年)	160
与官僚士大夫的交往	161
《般若经》的宣讲和佛教著述	164
整理佛典和《综理众经目录》	170
僧团和戒规	174
(五)在前秦国都长安的参政和译经活动(公元379—385年)	177
苻坚的最高政治顾问	177
组织翻译佛经	181

(1)《大品般若经》的补译——《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	
五卷和“五失本，三不易”	181
(2)翻译小乘佛经	183
(3)翻译戒律	193
(六)释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195
第三节 佛图澄、释道安的弟子及其传教活动	197
竺僧朗	197
竺法雅和“格义”	200
竺法汰	202
昙翼	204
法遇	204
昙徽	205
道立和昙戒	206
第四节 六家七宗	207
(一)两晋之际般若学的兴起和学派的分化	207
(二)本无宗	222
(三)心无宗	232
(四)即色宗	237
第五节 鸠摩罗什及其译经	251
龟兹的佛教	253
鸠摩罗什的家世和学历	257
后凉政权的军政顾问	263
后秦王姚兴与鸠摩罗什	267
鸠摩罗什的译经	273
鸠摩罗什的著作	285
鸠摩罗什的主要弟子	286
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292
第六节 早期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的传译	294

关于《阿含经》的起源	294
《阿含经》的翻译	297
《阿含经》的内容	304
1. “初转法轮”的中心内容——四谛、八正道	304
2. 以人生为对象的缘生说——十二因缘论	307
3. 早期佛教的哲学理论基础——五蕴论	311
4. “四姓平等”及其社会意义	315
第七节 鸠摩罗什所译佛教典籍的中心思想	318
(一) 译经概况	318
(二) 对外道及小乘佛教的批判	324
(三) 关于中观学派对《小品般若经》中“十八空”的论释	336
(四) “八不缘起”论	347
(五) 所说皆是可破	363
(六) 五眼与三智	375
(七) 实相即是涅槃	387
(八) 从“五力”、“四悉檀”到“二谛”和“中道”	401
第八节 《法华经》剖析	414
(一) 会三归一和籍权现实	417
(二) 开佛知见与诸法实相	424
(三) 从佛菩萨崇拜到法师供养	428
(四) 四安乐行与顿渐	439
第九节 鸠摩罗什的门徒和僧叡、僧肇	445
(一) 鸠摩罗什的门徒及其一般特点	445
(二) 僧叡	450
(三) 僧肇	470
1. 《物不迁论》	474
2. 《不真空论》	482
3. 《般若无知论》	493

4. 《涅槃无名论》	510
第三章 东晋时期南方的佛教	522
第一节 东晋社会与佛教	522
东晋社会和文化思想	522
佛教名僧及其传教活动	530
王公贵族与佛教	537
第二节 东晋士族奉佛的代表——孙绰、郗超	548
孙绰与《喻道论》	548
何谓佛，何谓佛道？	550
“周孔即佛，佛即周孔”	552
孝与出家	554
郗超与《奉法要》	557
佛教的道德戒条、斋法与儒家伦理	559
善恶报应与“防微虑始”的道德修养	561
对佛教修行结果的理解	566
第三节 比丘尼僧团的建立和东晋南方的寺院	568
比丘尼僧团的建立	568
东晋南方的寺院	574
第四节 法显西行求法与《佛国记》	580
西行目的	580
关于《佛国记》	582
从长安到西域	585
游历天竺	588
佛经翻译	595
东晋时期的其他西行求法者	597
第五节 慧远的活动和庐山僧团	600
从儒生到出家为僧	600
庐山僧团	602

慧远与王公贵族的交往	604
慧远与鸠摩罗什	613
慧远与僧伽提婆、佛陀跋陀罗	615
弥陀净土信仰和修行	618
慧远的著作	623
慧远的弟子	627
第六节 慧远的佛教思想体系	630
(一)沙门不敬礼王者——佛教礼法与封建礼法	631
(二)佛教宗教观念的创新和它的思想渊源	641
神不灭论	643
报应论	650
宗教的社会效果	654
(三)佛教世界观的佛典根据	656
(四)同鸠摩罗什僧团的佛学交流及其分歧	676
法身问题	677
四大与五根	684
法性问题	695
附录一：西晋、东晋十六国译经目录	702
附录二：历代佛教经录所载西晋、东晋十六国时期译经卷数	754
附录三：中国佛教史大事年表(西晋、东晋十六国)	756
索引	766
插图：一、十六国简表	128
二、鸠摩罗什舍利塔	252
三、法显西行求法路线图	579
四、庐山东林寺	601

第 一 章

西 晋 的 佛 教

第一节 西晋的社会和佛教

西晋社会

曹魏实行压制豪强地主阶级的政策，遭到长期享有政治特权的豪强地主阶级的反抗。魏文帝曹丕实行了“九品中正”选拔官员的办法，虽对豪强地主有所让步，但仍不能满足豪强地主阶级的要求。在豪强地主阶级的支持下，司马氏以政变的方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晋王朝，司马炎自立为皇帝，即晋武帝。晋太康元年(280)，晋灭吴。至此，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之乱以后出现的分裂割据局面结束，国家又归于统一。

西晋王朝是一个更能代表豪强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府，它取消了屯田制，制定了包括按官僚品级分配土地数额的占田制。事实上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根本不受任何限制。

西晋政权虽已建立，但当时的门阀地主阶级势力已极

为强大，他们之间争权夺利，不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们认为分散割据的局面对他们更有利。经历了东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政治局面，是民族矛盾和门阀士族阶级专政的结果。

扶翼司马氏上台的门阀士族都是世代王侯，占据中央和地方的高位，拥有大量田地和佃客，极端贪婪、残忍，骄奢淫佚，糜烂腐化。太傅何曾“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其子何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①；司徒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②；太仆石崇在任荆州刺史时以劫掠商客致富，有别馆在河南金谷，“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世说新语·品藻篇》注引《金谷诗叙》）。官僚贵族竟尚奢侈，传说武帝之舅王恺与石崇斗富，“恺以糒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王恺以武帝所赐二尺珊瑚示崇，崇用铁如意击碎，取出自己所藏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③。石崇置酒请客，有女伎吹笛失声韵，便殴杀之，“令美人行酒，”客饮不尽，斩美人。^④

① 《晋书》卷 33《何曾传》及附《何劭传》。

② 《晋书》卷 43《王戎传》。

③ 《晋书》卷 33《石苞传》附《石崇传》。

④ 《世说新语·汰侈篇》。